

# 鸳鸯

## 胡同

YUANYANG HUTONG

……  
列子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013070182

1253  
518

# 鸳鸯 胡同

.....  
列子  
著



I253  
518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北航

C167898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鸳鸯胡同 / 列子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69-4170-7

I. ①鸳… II. ①列… III. ①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754 号

责任编辑:王 琴

书籍设计:李瑞芳

## 鸳鸯胡同 YUANYANG HUTONG

---

作 者	列 子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邮 编	830011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170-7
定 价	36.00 元

---

## 自序

做了30多年新闻传播工作,写了30多年字,在操练各种新闻样式的写作之外,本着采、编、写相长之目的,信手撷英抚芽,既没有预设目标,也没有强求数量,只是想写的时候写,不想写的时候作罢,如同农人春花秋实地耕作,希望略略有些收成。但心里还是有个情结,对这些如同寓言里的“狗熊掰玉米一路掰一路丢最后拣到篮子里的一点小东西”(散笔札记),找个机会做一些归纳与整理。

有了这个想法,就想起我的一位挚友曾写过一篇关于出书的随笔。其中写道:“一个写字的人,从他开始操练文字的那一天起,恐怕在潜意识里都怀着出书这样一个梦想。读别人的书读到一定数量、读到一定程度,自己的文章也做多了,有些味道了,便不由生出一种企望,想在那密密的书林里也添它一枝,让别人来采撷。”其实,这是我与他共同的认识。

但是,自1991年经新疆作家协会推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子《樱桃》之后,我对出书一直有些忐忑和踟蹰,这是因为随着阅读环境和阅读方式的变化,感觉当下对出书似乎已经没有了敬畏感。社会进入了人人出书的时代,即便这个人写不了书,让他人代写出书也不鲜见。这一方面凸现群众的文化权益和文化表达权,以及出版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元化;另一方面书籍本来就是文化产品,读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可在我的意识里,始终对写书出书心存敬畏,认为写书出书终是与上面略有些不同,因而对出书与购物一样变成一种完全纯粹的消费行为,尤其是自己花钱买自己的文字,且将自己文字制成的一定数量的书(或称作纸制品)买回家,始终心

存困惑,觉得既浪费资源,也不符合低碳原则,因而心里总是怀着一丝纠结。

前些时候,偶遇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石永强书记,承蒙他的关注和支持,终得到一个对自己作品盘点归纳的机会,内心的些许不安也从他那儿得到了一些释解,便从散见于报纸杂志的百十余篇散文散笔作品中选择了近60篇大约十五六万字结集成册。

非常有缘的是在我的操文写作过程中,几位关注我的师友与兄长多有励勉,他们在我的写作还比较稚嫩的时候,便热情地指教并赐文予以鼓舞。周涛先生是第一个为我的文字鼓劲的,他于1986年6月11日撰写了《读列子的散文》(刊于《中国西部文学》)。那时我的作品量还不是很多。周政保先生1987年5月2日以4000字的篇幅为我的作品撰写评论《列子和她的散文》(分别刊于《中国西部文学》和《新疆日报》),并成为我的散文集《樱桃》最长的跋文。黄旅德先生的文章发表于《新疆社科战线》杂志,在收存过程中散失,甚为遗憾。还有著名作家、《散文》杂志主编、后成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领导的石英先生,他第一个在《散文》杂志发表了我尝试着投寄去的拙作《樱桃》(详见《静水深流》)。在此我对诸君怀着十分的感念。最让我难忘的是老一辈著名作家肖无先生,1991年我的小集子《樱桃》刚面世,他便为我这本小小的书撰写了评文《浓浓的葡萄汁》(刊于1991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给予我励勉。肖无先生仁者寿,以91岁鹤龄西去。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向诸君和肖无先生致以敬意。

列子

2013年3月

# 目录

---

## 报人报事

扬子江路 1 号的片段 / 3

鸳鸯胡同 / 10

奚大姐的白菜宴 / 14

窗外的橡树 / 17

搬家 / 19

闰二月 / 22

日新如斯 / 24

烹文煮字当编辑 / 26

落霞犹自舞 / 29

肖廉不老 / 31

丽人西去 / 33

精致高兰清 / 37

元宵雅昌艺网探张莉 / 40

## 新疆孩子

太克 / 45

阿依登 / 48

佳娜什 / 51

黑桑甚 / 54

樱桃 / 57

### 读书读人

1989年：一位部长与一位作家 / 63

刘肖无与《解忧》 / 67

写不尽的新疆 / 71

静水深流 / 73

诗心盈盈一儒生 / 76

功臣与《书潭独酌》 / 79

承受生命之重 / 81

师友丁丁 / 84

远足的人 / 86

白鹰的画 / 90

### 往事芬芳

旧事六篇 / 95

向马得先生求画 / 110

一枚印章 / 113

人民日报西门的两株银杏 / 116

伊犁浅行 / 119

香椿芽 / 123

新疆北部三日行 / 126

眼里美心里美 / 132

乔尔玛 / 136

都是有缘人 / 139

快乐读书 / 141

大家与我们的距离 / 144

- 家住乌鲁木齐 / 146  
太阳·草莓·三叶草 / 149  
桂林三读 / 152  
峰奇水秀七星岩 / 155  
重阳 重阳 寒婆婆过江 / 158  
故纸有香 / 161

### 域外读记

- 百闻不如一见 / 167  
人境奇葩特拉维夫 / 172  
海法:敞着门的家 / 176  
戈兰高地 死海古卷 / 180  
耶路撒冷:一本打开的书 / 185  
行走的阅读(1) / 190  
行走的阅读(2) / 193

### 报告文学

- 重逢在今天 / 199  
作曲家阎飞回故乡 / 207  
含笑 / 210  
和田姻缘 / 223



鸳鸯胡同



报人报事



## 扬子江路 1 号的片段

在扬子江路 1 号大院的众人之外,最熟悉扬子江路 1 号的,莫过于乌鲁木齐市的邮递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尚未普及的时候,乃至今日,他们每天将大宗的信件和稿件送进来,又将散发着墨香的报纸送出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辈子都和这个大院发生着关系。

这个大院东临人民公园,北起友好南路,南隔文化宫路,向西的大门便对着乌鲁木齐市中心邮局。据前辈们讲,早的时候,院墙不高,住在靠南头宿舍的人,越墙即可坐在文化宫的影院看电影。

还是前辈们讲,更早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菜地,因为傍着乌鲁木齐河,土壤湿润,菜蔬长得特别好。加上相邻的西公园(人民公园)春天杨柳依依,秋天花树斑斓,居住在乌鲁木齐南门以北,北门以南市中心的人,都到这里踏青、赏秋。常常是手风琴的乐曲穿过树林缭绕,五色风筝在蓝天上扶摇。

前辈们还讲,后来这里有了一个印刷厂,随之有了一家报馆。再后来,一些身着制服的人进进出出,编一张名叫“天



山日报”的报纸。最轰动的是1939年6月1日，茅盾先生来这家报馆演讲“子夜的创作”。据说，茅盾先生来新疆的路上写了《白杨礼赞》，皆知。此前的1939年4月12日，茅盾先生还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新疆文化发展之展望》。所以，当天乌鲁木齐的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甚至大凡认得字的人，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打那之后，这里便成了文化人的中心，一时引领着新疆抗日文化、进步文化的时代之风。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这家报馆，诞生了人民的《新疆日报》。

如今，这个大院虽然被削去了一部分，但仍有71000多平方米，换算一下，也有百余亩。院里坐落了30余栋楼屋，在职的、离退的、子报子刊聘用的，加上家属孩子，据说超过六七千人了。

城市是个圈子，将很多不同背景、不同经历、不同人生的人圈在一起，过一种大致相同的生活。扬子江路1号大院是一个小圈子，将一些有志向，或者进来了才有志向的人圈在一起，过一种与新闻传播有关联的日子。

时光如水，青蓝相继。我也有幸被圈了进来，从少不更事到今天也被称作“前辈”，方知这个大院的价值、原则、规矩、生态、环境、元素，已被光阴穿成了珠链。

俗话说：一天一根线，十年织成缎。如果进来算作一个“点”，出去算作一个“点”，两点之间是线段。我想，我也应当是穿珠链的某一截线。因而，我将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写成《扬子江路1号大院的片段》，以记我在这个圈里浸泡搓洗晾晒的那些日子。

## 走进扬子江路1号

1975年7月7日，我手持自治区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报到证，来扬子江路1号报到。其实，在这之前的1974年，我因被借到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办公室帮忙，已经出入过这个大院了。那时，自治区提前一年筹划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决定拍摄一部纪录片。我尚未毕业，因发表了一些今天看来很幼稚的东西，被抽调到纪录片组，参与解说词的撰写。记得给我的段落是修塔尔朗大渠的情节，画面是一只蜥蜴爬上一块被晒得发烫的石头，顿时蜷缩成了一个黑点，这时铁木尔·达瓦买提阿卡赤手搬起了这块石头。这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副委员长）的农民的儿子，当时是火焰山下一个公社的书记，这个情节是专为他拍摄的。

相关内容后来还被写进中华儿女杂志的“共和国赤子——铁木尔·达瓦买提”章节。纪录片组这个团队很棒，当时自治区重量级的人物，如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编剧卢欧琳，小说《军队的女儿》作者邓普，诗人吕绍堂，文学主编韩文辉等等，都是业界学界尊敬的人，跟着他们方知新疆文化深深的根脉。他们各自不同的气质学养，举止仪表，或严谨、或书卷、或性情，都让我开眼。尤其是欧琳老师，我们同居一室，平时只看到她美丽孤傲，先锋时尚，其实她很生活味，带我到她家里，给我做上海风味的萝卜丝饼，亲切和蔼随性，并不是大家说的“冷美人”。

也许有这点儿经历，报社文艺组的几位老师将我借来用，因而对报社这个大院不算很陌生。

但进了人事处(当时称政治处)，我还是有些无措。因为办公室的人正在扎花圈，面情都比较凝重。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一位被称鲍科长的人走到门口对我说，现在顾不上，你过两天来吧。

既然有事，两三天怕是处理不完的。所以，我没有着急，过了大概一周才又去报到。这回，那位鲍科长急了说：“你怎么才来啊！”便将我领到处长姚希珍的办公室(后来知是富文同志夫人)。姚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衣着朴素，非常典型的那个时代老干部形象。她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便将我领到二楼的编辑部主任办公室，将我介绍给主任高光强同志，副主任汪叔度同志。高光强同志个头高高的，陕西人，热情地说：“欢迎你来，等你好几天了。你的情况已经知道了，去文卫组工作。”那时，文艺、文化、教育、卫生，都在这个大组，文艺副刊自成一个小组。

2007年11月，我在湖南参加会议，承蒙湖南日报谭毅挺等两位“大侠”安排，到洞庭湖看岳阳楼和君山岛，不料岳阳日报的老总“谭大侠”的家和高光强同志住在一个干休所，恰好碰着了高光强同志。他对我说：“高光强同志很夸奖你。”遗憾的是从君山回来，候机的时间到了，我们便直奔了机场。这么千里迢迢来了一趟，却未能去看望高光强同志，我心里一直很歉疚。

高光强同志将我领到总编辑苗风同志办公室，说分来的学生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家省级党报的老总，第一次走进总编辑办公室。只有一间屋，还放着一张简易的单人铁床。唯有的不同是有一把皮革椅子，一张稍大点儿的写字桌，上面摆着一个老式台灯和一个大大的烟灰碟，还有半截粗大的烟，并摊开着一张报样。



苗总编一看就是文化人，有一种书卷气。他抬起头问我：“学中文的？写过小说？”我赶紧回答：“汉语言文学专业。没写过小说。”他又问：“是张文彬的女儿？”我一下摸不着头脑了，赶紧又回答：“不是，我不认识。”他盯了我一会儿说：“噢，欢迎你来，正需要人呢。”

此后，我一直留心谁是张文彬？后来韩文辉老师告诉我是著名作家杜鹏程的夫人。1985年，自治区成立30周年，我在副刊上开了一个栏目“我与新疆”，碧野、徐迟、袁鹰、阎纲等先生都赐了稿，杜鹏程先生的稿子是先发给了兵团一本刊物，刊物还没出来，他回信说报纸可以先用。从这时开始，我与杜鹏程先生有了书信约稿。1995年，自治区成立40周年，我又在副刊开设了“名人名篇写新疆”专栏，这时杜鹏程先生已经辞世，回信是由张文彬先生写的。2005年，自治区成立50周年，我组织了一个特刊，再联系，杜鹏程先生的女儿杜稚回了信，并发了电子邮件。2006年、2007年，两次到石河子参观农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在这里看到了张文彬先生的照片。谈起这段往事，同行的同事和朋友都说确实哪儿有点儿像。这让我常常想起苗风总编这个随性有趣的人和头一回见他的情景。前面分来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当时见苗总编时，苗总编问她：“会写电影评论吗？”她以为要到文艺副刊组了，结果到了农牧组。

后来，在编辑部上班了，又有两次被问到“你是某某某的女儿？”问的都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我当时想，新疆日报的人怎么都这样问话呢？后来熟悉了，问这话的一位前辈说，他问的人是他们在五七干校时上面派来看管他们的人，相处不是太和谐，又传这人的女儿分到报社了，才这么上上下下说起来的。当时让我感觉环境有些复杂。时间久了，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只不过不是我。据新华社发表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消息，张姓超过一亿人口。看来，姓也是可以惹是生非的。如今，人们即便关注某人有什么背景，也不会说出来。社会更宽容温和了。

说到这儿似乎有些离题了。

## 横是栏 竖是行

进了文艺副刊组，即赶上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那时汉文、维吾尔文文艺副刊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进入角色没多久，有一天快下班时，我的直接领导高

庚同志和资深副刊人礼魂(李魂)看办公室没有其他人了,便来到我的桌前。因为此前在这里被借调过,比较熟悉。他们神兮兮地问我:“有男朋友吗?”我说:“有啊。”老高笑了,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将来条件就好了,报社要盖一座8层大楼,会宽敞一些。我们都是快点完的蜡烛,你能赶上。”这个“画饼”很让我期待,却始终高高挂着。后来经过“八年抗战”,报社终于盖了一座20层办公楼,当年在周边还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如今已被更高更气派的大楼遮盖。高庚前辈是我在报社见到的最斯文儒雅的人,曾是当年报社的四大笔杆之一,虽然那时写什么文章和稿件都不允许署个人名字,高庚却以撰写社评和社论而知名。后来,礼魂开玩笑狡黠地对我说,老高看上你想给你介绍朋友呢。我知道肯定是他找乐子涮我这个新来的人。

礼魂前辈当时已是名人,60年代中期与他当时的太太卢欧琳联袂创作,由大牌导演崔嵬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天山上的红花》全国热映。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被新疆多民族文学资源吸引来到新疆电影制片厂做专业编剧,后因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电影厂下马来到报纸做副刊编辑,曾发表过十五六个影视剧剧本,比如后来走上银幕的《不当演员的姑娘》《现代角斗士》《亚细亚阴影》等,著有长篇小说《葱岭》《白雾》《雪崩》等,文学根底深厚。他还是一个极具冷幽默的人,毫无表情冷不丁讲个笑话让人笑破肚皮。有一次通联组分发来的稿件中有一封给他的信,称他“亲爱的文学妈妈”,让大家一阵好笑。但信的内容是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小组反映一名工人没按规程操作触电死亡,车间里争论不下,一部分人认为死在岗位上,比泰山还重;一部分人认为违规操作,比鸿毛还轻;请教他这个“文学妈妈”给个评断。当时文革造成的群众对立还未完全消除,使这个本来普通的安全生产事故变得像个冷笑话,像个世相哈哈镜,让人有些心疼,笑不起来。副刊作为报学现象,对人文精神的涵养,对社会的营养,从那个时候就凸现出来了。

当然,礼魂是个故事多的人,有一次他突然发现自己丢了很多年的自行车竟然停在楼下,那是一辆英国产的车,是他与欧琳结婚时欧琳的父亲从国外带回来送他们的结婚礼物。他说车的模样和颜色乌鲁木齐绝没有第二辆,欧琳生孩子时他去医院送饭出来便丢了。很多年过去了,车还能回来,难道上天知道这是他的车?



这让他惊喜得一直在楼下等着，直到取车的人来，他跟着人家回去问，主事的人冷冷地对他说这辆车无主，早就是工宣队的公用车。当然，车最后还是归还他了。

副刊的另一位前辈是诗人张朴夫，徐州人，高兴时用带徐州话的发音朗读他的诗，读毕哈哈一笑，声音很厚。那时住房比较困难，一大家子人就一间房，吃饭睡觉孩子做作业全在里边。于是每到晚上办公室就成了大家公共的家，灯光通亮，信息在这里汇总交流，真正的编辑部故事这会儿才发生。副刊当属比较安静的，但偶尔也会像锅开了热气腾腾，有一回朴夫将办公室的窗帘搭在肩上，模仿维吾尔语《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用维吾尔语表演“临刑喝妈一碗酒”的对白，那模样让人笑翻了椅子。后来我们一起到库车一区公社参加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朴夫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写思想汇报，他那时在积极争取入党。上世纪70年代末他调到无锡日报，写了一本采访宋长荣、申凤梅等名角的采写笔记，一本关于王洛宾和三毛的书，又写了一本豫剧名角牛得草的传记，不过最让人知道他的是电视剧《吴仁宝》，他是编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他也因此成为华西村荣誉村民。有一年我去无锡开会抽空去看他，无锡日报同志说他不在家，去了华西村。朴夫是个腿勤的人，对文艺界非常熟悉，我第一次采访王洛宾先生是他带着去的，那时洛宾先生才刚刚恢复工作。2007年8月15日朴夫夫妇在离开新疆28年后终于有机会回来看看，为他们接风时，他仍然厚着嗓音说要吃拉条子、羊肉串、米肺子，便只好在报社附近找了一家维吾尔人经营的“白金餐厅”，请他们夫妇吃了一顿他们“想得不成”的新疆饭。

以上让我看见了这些前辈们的另一些侧面。

有师指导，我就上阵了，几位前辈交给我一把组版尺，一本字号簿，告诉我“横是栏竖是行，文字老五号”，让我熟悉版面和编辑工作，我的副刊编辑生活宣告开始。那时还没有激光照排，也没有电子排版系统，全靠手工铅字编排，至少得弄清楚基本栏和文字容量。有一位编辑没算对栏，文字量涨出了好多，一位老资格的车间排字师傅当着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干不了别干，别折腾人！”这让我心里不免有些惶恐，但几位前辈都很放手。在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我也真的拿出了一首诗歌专版。那时没有专业翻译，维吾尔族诗人买买提·夏吾东（后为新疆作家协会主席）将他欢迎中央代表团的长诗按照意思逐句告诉我们，我们再搜肠刮肚用汉



语词汇组成诗句,居然大家都说又华美又喜庆。

再之后的之后,副刊不用交到专职组版编辑那里组版了,由编辑自己组版,而且从我这儿开始。当时正上映一部反特电影《猎字 99》,肖廉君说:“那就从‘列子 01 号’开始吧,等到 99 期时全组人请你吃饭。”后来真到了 99 期,我已经开始当副刊主持人了。再之后,副刊一步一步走向开放走向多样,我们又细分开设了“宝地周末”“艺苑”“博闻”“读书”“文化周刊”“作品”等多个专刊。为了增加副刊的深度,我们坚持每一期都要有言论或者杂文,但来稿里这样的稿子很少,质量也上不去,于是每个编辑取了个笔名人人写杂文或者小言论。李强给自己取了个“大本”;功臣取了个“班吉”,那是一只小狗的名字。我应对李强的“大本”取了个“小书”,表示自己很浅的意思。这个办法还不错,渐渐来稿多了,栏目成型了,最终成为副刊至今的保留栏目,并从中成长起一批杂文写作者。后来只要是写言论稿,我都用“小书”这个名字,如今剪报存下来的各类大小言论稿大约有近百篇。但在当时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位老同志认真地对我说:“全疆人民才有这么一块园地,自己人的稿子少一点,尽量用群众来稿吧,群众办报嘛。”如今报纸为自己人留着版面等稿子,想尽办法鼓励多写,常让我慨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多么幸福啊!

有一段时间,全国很多报纸都将副刊改成了娱乐版,一时成风。我们没有跟这个风潮,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坚持以大文化视角、多民族文化元素表现我们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因之在全国副刊中排名靠前。2005 年由中国记协、国家新闻出版局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苏州召开全国报纸副刊工作会议,我幸运地获得“新时期报纸副刊突出贡献奖”,这个奖只颁了 10 个,西部地区就这一个。在这里提及不是想自己表扬自己,只是想说每一个副刊编辑都是与副刊共生共荣的。当然,这段经历给予我的积累让我对“烹文煮字”终不觉悔。

我当文化记者、副刊编辑、文艺部主任、报社副总编,主持、分管、经营副刊 33 年多,却是从“横是栏竖是行”开始的。当中酸甜苦辣却文心盈盈,幸得许多优秀的前辈指点同辈扶持,经历的许多人与事将在后面另章提及。

(2012 年 11 月)